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爱国主义教育丛书

新四军



一、烽烟滚滚举大旗

1937年春夏之交，华北地区的紧张局势愈演愈烈。从4月下旬起，日本在中国的驻军开始在平津近郊举行战斗演习。进入6月，演习更为频繁。尤其是驻丰台的日军河边旅第1团，竟以攻夺卢沟桥、宛平城为目标，不分昼夜地进行演习。当时，北平已处于日军的三面包围之中，西南方向的卢沟桥成为北平对外联系的唯一通道，战略地位极为重要，驻守此地的中国军队是第29军。

7月7日夜，日军驻丰台的第1团，又在卢沟桥东北龙王庙附近举行军事演习。10时左右，突然听到日军演习位置响起一阵阵激烈的枪声，少顷，几名丧心病狂的日军来到城下，声称丢失一名士兵，要求进城搜查，遭到守军的拒绝。日军第八连连长清水节郎一面派兵包围宛平城，一面派人去丰台请求援兵。20分钟后，因解手而离队的“失踪士兵”已归队，但清水并不报告。8日凌晨，营长一木清直率领援兵赶到现场，并指挥部队占领了宛平城外的沙岗。5时半左右，日军团长明知失踪士兵已归队，却下令向宛平城发动攻击。守军奋起反击。炮火连天，枪声不绝，弹片横飞，战斗非常激烈，双方激战约1小时，互有伤亡。下午5时，牟田口发出通牒，限中国守军于当天下午8时前撤至永定河西岸。刚到下午6时，疯狂的日军即炮轰宛平城发动攻击，城内军民死伤甚众。9日凌晨，我军突击队夜袭铁路桥，全歼了日军一个连，收复了永定河东岸阵地。几小时后，中日双方代表达成口头停战协议。揭开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序幕。

卢沟桥事变发生的次日，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表通电指出：“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生路！”9日，中国工农红军将领致电蒋介石，要求全国总动员，并代表全体红军将士请缨杀敌。

共产党积极抗日的主张，搏得全国同胞的赞许，蒋介石迫于压力，在万般无奈之下，终于接受了共产党关于国共合作抗日的主张。

8月22日，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随后，蒋介石公开发表了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和国共两党合作的谈话。至此，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成立。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

八、九月间，中共中央委派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与国民党就改编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为抗日队伍等问题，进行了谈判。在谈判中，国民党企图削弱、控制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不肯给予正式番号 and 必要的武装，还要派人到红军中任职。经过中共中央的一再努力，加上日军侵略华中的气焰越益猖狂，国民党方才与中共达成协议，同意将南方八省13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1个军。至于这支抗日队伍的军长人选问题，双方在继续谈判，一时相持不下，最后蒋介石蛮横不讲理地宣布找一个无党派人士当军长，实际上

也就是宣布红军游击队改编告吹。

8月间，正与国民党进行谈判的周恩来在上海会见了刚从国外返回祖国参加抗日的叶挺。大革命时期以及南昌起义期间，周恩来作为叶挺的领导，与叶挺并肩战斗过，对叶挺的表现十分了解。叶挺现在既不是国民党，又不是共产党，是最好的军长人选。周恩来以个人的名义建议叶挺出面参加改编南方红军游击队的抗日工作。

周恩来的热诚鼓励，使叶挺受到很大鼓舞。为了抗战，为了国内团结，叶挺毅然接受这一使命。叶挺向国民党方面表示自己愿意参加改编南方红军游击队下山抗日的工作，蒋介石欣然同意叶挺关于出面改编南方红军游击队的意见，蒋介石认为叶挺是一位北伐名将，在国内军队内享有很高声望，现在已经脱离了共产党，可能与共产党还不一条心；如果利用叶挺来改编和控制南方各省游击队，正是一个好机会。

10月下旬，叶挺应中共中央的邀请前往延安，于11月3日抵达，叶挺在延安期间，受到了党中央、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的亲切接待。毛泽东向他详细讲述了当前国内外的形势，解释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方针路线与策略，并对他表示完全信任和支持他出任新四军军长职务，但必须坚持完全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让国民党插手和干涉等条件。叶挺表示完全服从党中央的决定。

毛泽东还征求他的意见，是否愿意恢复党籍？叶挺表示“愿在党的组织外，但在党领导下进行工作。”党中央也考虑到叶挺暂在党外，对促进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有利，同意叶挺暂时不立即恢复党籍。

根据中共与国民党达成的协议，10月12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将在湘、赣、闽、粤、浙、鄂、豫、皖8省边界地区的工农红军游击队和红军第28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1937年12月新四军军部在武汉成立，1938年1月6日移驻南昌。从此新四军同八路军并肩作战，成为中国人民抗日的重要力量。为挽救民族危亡，新四军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旗，在广大的华中地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战斗，独立支撑大江南北半壁河山，成为华中地区抗战的主力军，为夺取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新四军最初编制及领导层：

叶挺任军长，项英为副军长，张云逸为参谋长，周子昆副参谋长，袁国平为政治部主任，下辖4个支队，第一支队司令陈毅，副司令傅秋涛，参谋长胡发坚，政治部主任刘炎；第二支队司令张鼎丞，副司令粟裕，参谋长罗忠毅，政治部主任王集成；第三支队司令张云逸（兼），副司令谭震林，参谋长赵凌波，政治部主任胡荣；第四支队司令高敬亭，参谋长林维先，政治部主任肖望东。全军10个团、1个教导营计10300人，6000支枪。

二、勇士出击战辉煌

新四军成立后，很快打了几次大胜仗。

韦岗初战

韦岗，在镇江的西南 30 里处。从南京至镇江的公路上，日军的车队来往频繁，每天平均有二、三十辆车。一日拂晓，部队进入伏击阵地。此处山高、路窄、林密，即便于隐蔽，又便于攻击。8 时 20 分，果然从镇江方向开来 5 辆日军的汽车，为首的是一辆轿车。战士风趣地说：“头一仗就送一个大官作见面礼！”

战士们摩拳擦掌，屏住呼吸就等着指挥官的一声命令，当车子进入伏击区，随着一声高喊“打”，顿时日军的车队陷入了我方严密的火力网中，鬼子抱头鼠窜，炸得死的死，伤的伤，有的在泥地上挣扎打滚，成了泥人。这时，指挥官手枪一举，高喊着“冲啊！”战士们端着明晃晃的刺刀奋勇向敌群冲去，杀声四起，经过半小时格斗，这股敌人全部被歼。我军无一伤亡。

韦岗伏击，首战告捷。它打出了新四军的军威！严惩了侵略者。自此之后，竹子岗战斗、新丰战斗、句容战役、牛角湾战斗，这一连串胜利，不但大大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同时在人们的心中树立了新四军的崇高威信；

黄桥战役

1940 年 7 月 25 日，遵照中共中央指示，江南指挥部进苏北地区的部队组成苏北指挥部，并东进黄桥，27 日到达黄桥地区，随即向南发展一举攻克孤山、西来等日军据点。粉碎日军两次报复性“扫荡”。此时，国民党鲁苏战区副总指挥韩德勤，制定了作战计划，指挥部队向南进犯，进攻苏北指挥部。韩德勤派出手中的王牌主力李守维率领军队为中路军，从北面 and 东面进攻黄桥，以李明扬等游击军为右路军，从泰州向黄桥进攻；5 个保安旅，组成左路军，掩护主力两翼，从东南向黄桥进攻。声称要拿下黄桥，要全部消灭新四军，活捉陈毅。

陈毅接到情报，便召开紧急会议进行了战略部署。陈毅的得力助手粟裕带着作战参谋和向导，侦察了黄桥周围 200 多里的地形，制订了以黄桥为轴心，诱敌深入，迂回包围，各个击破的作战方案，作战方案呈报中央军委后，粟裕进行了战略部署，这次黄桥之战，是奠定苏北抗日根据地基础的关键一仗，延安和全国的进步势力都在关注着这一仗的成败。

就在新四军进入阵地，枕戈待旦之时，黄桥的民众成立了支前组织，他们帮助部队筑工事，扎担架，做军鞋，印传单，有的在阵地前后侦察敌情，放哨巡查，散发宣传品，妇女儿童都参战，妇女、老人日夜做烧饼，一筐筐又脆又香的黄桥烧饼源源不断送往阵地，黄桥民众忙得热火朝天，战士们摩拳擦掌，士气高昂。

顽军的左路、右路皆被新四军挫败。李守维组织的中路疯狂进攻黄桥，此时，新四军正聚精会神地听粟裕作总攻动员，战士们跃跃欲试，就等李守

维送上门来挨打，此时的李守维成了瓮中之鳖，开始，他组织部队拼命进攻，黄桥坚如磐石，始终攻不下。嘹亮的军号响起来了，此时杀声冲天，火光四起，烟雾弥漫，顽军四处逃窜，李守维仓皇逃跑，被一条小河挡住了去路。发了疯的残兵败将争相逃命，你推我攘向唯一的一座小木桥涌去。李守维身不由己，也被人流推上了小木桥，失足跌入河中，扑通几下，笨重的身躯便沉下去了。

此次战役共歼顽军 1.5 万人。黄桥决战胜利了，新四军在苏北站稳了脚跟，就能完成中央赋予我们开辟苏北根据地的战略任务。

曹甸战役

1940 年 11 月下旬，国民党顽固派开始第二次反共高潮，以皖西、山东部队向苏北前进，增援韩德勤。韩部也先后攻占八路军凤谷村、益林等地，并有继续扩张之势。中原局根据这些情况决定集中主力 10 个团，进攻曹甸（宝应城东北）地区顽固派军队。11 月 29 日，战斗打响了，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喊杀声，震耳欲聋，新四军动作极其敏捷，敌人逃到哪里就追到哪里，接连攻克宋庄、蒋营、陶家林等地，歼顽军 8000 余人。

三、内部矛盾埋祸根

随着形势的发展，新四军领导人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起来。副军长项英是工人出身，论职务，他曾一度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之上，长期担任党内高级职务。1920年，他就组织武汉纺织工人首次罢工；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的那年他组织全国第一个工人俱乐部，组织过震惊中外的京汉铁路“二·七”大罢工，1922年入党后，多次选为中央委员，1931年担任中央局书记和军委主席。1935年红军长征时，他与陈毅留下，领导南下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率领红军游击队下山抗日，担任新四军副军长，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东南局书记、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对中国革命事业作出过重要贡献。但由于他在长期的政治生涯中处于顺境，渐渐形成了政治优越感，骄傲自满，家长制作风严重，又由于长期处于闭塞的游击战争环境中，较少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因而马列水平不高，眼光短浅，政治上易犯忽“左”忽“右”的错误。

叶挺的经历与项英完全不同。他早年进过正规的军校学习，是党的人民军队创始人之一，参加过北伐战争和两次武装起义，表现了较高的军事指挥才能和军事思想。他的经历比较坎坷，后来脱离了党的队伍，流亡德国。当他知道国共第二次合作的消息，再也按捺不住保卫祖国的赤诚之心，终于告别妻儿，踏上归国征途。由于他在国共两党中都有过密切的关系而形成了自己的特殊身分，在国共合作过程中，对沟通两党关系，促进共同抗日事业能够起到应有的作用。但另一方面，由于他自己较长时间与党失去了联系，因而对党内情况较为生疏，一时不适应；而他自尊心极强，受不得委屈，不能容忍别人对于自己的歧视，因而他与项英产生了很大的矛盾。

在筹建新四军过程中，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领导人经过慎重的考虑，确认叶挺是担任新四军军长、领导全军抗战最理想的人选；只是由于考虑到叶挺暂时留在党外，对推动两党关系，促进抗日事业有利，故没有恢复叶挺党籍。因此中央给军部的电报叶挺看不到，重要会议不能参加，新四军军政大权掌握在项英手中。项英对这个国民党任命的无党派军长不大信任。但又有点畏惧，一则因叶挺军事上素养甚高，自己说错了怕他笑话；二则叶挺注意军纪，穿着整洁的将军服，极少言语，自有三分威严。项英背着叶挺搞小动作，拉小圈子，以至散布一些流言蜚语，甚至不负责任地背着叶挺向中共中央告叶挺的状。叶挺无法忍耐项英的霸王作风，于1938年10月，他愤然出走，并向毛泽东、蒋介石寄去辞职报告。

早在1937年11月，项英在延安期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领导人将叶挺合作领导新四军的决定告诉了他，要求他与叶团结一致，共同抗日，并注意尊重叶挺，军事方面多让叶作主，项英担负政委的任务。但项英十分傲慢自负，没有把中共中央的指示放在心上，相反对叶挺抱有成见，对中央安排叶为正，自己为副，极为不满，他认为自己在军事、政治上有一套，认为

在军事方面应自己作主。因而他与叶挺的关系十分紧张、思想路线分歧很大。

周恩来亲自组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支军队——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为了组建新四军，周恩来呕心沥血，多次来往于延安、南京、武汉、重庆，代表中央与国民党谈判、交涉、协商，就连新四军的编制和从军长到团长的人选，都倾注了他的心血。

周恩来又把精力放在解决叶、项矛盾上。周恩来找来项英，耐心分析原因。周恩来说道：“第一，你的家长制作风未改。我和毛泽东多次找你谈，你并没改。结果，南方3年游击战期间，你也是不听陈毅的劝告，时而争吵。第二个原因，你看不惯叶挺，你总是以你的眼光看待、认识别人，叶挺喜整洁，有将军风度，喜欢照像，爱好打猎有什么不好？个人所受教养不同，各人有各人的生活方式。第三个原因，你对叶挺太缺乏了解，缺乏坦诚相见精神。”

周恩来顿了一顿，又接着说：“我认为，看一个人，要看本质，只要人热爱党，一心抗日，对革命忠心耿耿，他就是好同志，就要团结他一道工作。”一番话，项英渐渐开了窍，说得项英不住地点头，令项英佩服不已。他诚恳地表示：“我一定注意改正，和叶将军搞好团结，把工作搞好。”在周恩来主持的军部领导人会议上，项英作了自我批评，主动提出将军事指挥权、军事干部安排权交给叶将军。中央对叶挺也作了大量的工作，说服了叶挺重返新四军。

以后，叶、项关系一度改善。叶挺在项英的支持下，成立了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组建了第五支队，对发展和巩固新四军在江北的力量作出了贡献。然而时隔半年，叶、项关系再度紧张，导致叶挺第二次出走，第三次辞职。

四、皖南奇冤震中外

一向奉行“攘外必先安内”反动政策的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只是迫于全国人民的压力，在万般无奈之下实行联共抗日的政策。但是，随着抗日战争的深入进行，蒋介石对于共产党在敌后的发展趋势，坐卧不安。在日本侵略者对国民党实行政治诱降下，蒋介石将其政策退回到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道路。将其反动活动的重点由华北转到华中，由八路军转向新四军。一时间，华中敌后阴云密布、局势严峻。

中国共产党早已预料到国民党这一阴谋，经过反复研究，权衡利弊，制定了全面的对策和斗争方针，决定对皖南取让步政策，同意将皖南部队转移到江北。

1938年，新四军部迁到皖南泾县云岭以来，一直孤悬皖南。云岭地方很小，军部设在那里目标很大，并且，此地区地形狭窄，北边靠长江，东边接近日军，西面和南面则是国民党军队的防区，驻有大量国民党军队，对皖南新四军形成包围监视之势，新四军陷于十分被动的地步，有随时遭到被围歼消灭的危险，形势非常严峻。

此时，蒋介石正阴谋策划围剿新四军的作战细则，蒋介石阴险狠毒的狂喊：“活擒叶、项，一网打尽新四军。”围剿皖南新四军的乌云已在皖南上空聚集，暴风雨就要来临了。

叶挺积极认真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北移的指示，并为实现皖南部队和军部北移作了大量的准备工作，由于项英对待中共中央的北移指示采取阳奉阴违，出尔反尔的作法，一方面制造诸多借口，拖延北移，另一方面却又无赖地向党中央请示“行动方针”。因此新四军皖南部队的北移以及叶挺指挥北移的准备工作，受到了项英的一再干扰和阻挠。

1940年1月31日，项英终于决定皖南部队随军部一起于1941年12月4日正式“向南”北移。消息传开，成批的群众压抑着悲痛的心情，昼夜与新四军话别，群众纷纷为新四军缝补军衣送来了干粮，杀猪宰羊，为部队饯行。为了告别休戚与共3年的乡亲们，军部以叶挺、项英的名义宴请各界人士，向群众告别。群众抱着战士，战士拥着群众，说不完的道别话，群众千叮咛万嘱托，希望新四军再回来，一位妇女代表难过得放声大哭，在场的人也都呜咽起来，就连钢铁制成的将军——叶挺将军的眼眶也红了，那难舍难分的情景，真是看了让人流泪，皖南沉浸一片深深的悲痛之中。

1月4日黄昏，皖南新四军冒着蒙蒙的细雨，告别了父老乡亲，在叶挺、项英的率领下，含着眼泪唱着悲壮的《新四军东征歌》，离开驻地，踏上了征途。

叶挺军长和往常一样，身穿黄色的呢制将军服，高大魁梧的身躯，挺拔威武，他手里习惯地提着手杖。面容严肃地走在队伍的前面，后面是项英、袁国平等，队伍在泥泞的道路上高一脚、低一脚地前进。雨越下越大，天黑

路滑，行动十分困难。本来熟悉的地形变得陌生，迷失了方向，人们转来转去，顿呈混乱状态。好不容易到章家渡，因平时河水很浅原计划涉水而过；但因连日下雨，河水猛涨，部队行至青弋江边，猛涨的河水使早就架设的浮桥短缺，只好临时找来木头、煤油箱等器材，架设浮桥而过，部队拥挤着上浮桥，仅过了千把人，浮桥便被压断了。没有过浮桥的又得涉水过河，战士们的衣服、武器等都弄湿了，在寒冷的季节，瞬间结成了冰。经过这番折腾，战士们又冷又饿极度疲劳，队伍十分混乱，行进缓慢。由于人马过于疲劳，项英决定在茂林一带就地休息一天，但这也给国民党进剿部队赢得了一天时间。

皖南部队正式开始北移的消息，已被潜伏在军部周围的国民党特务所掌握，消息传到了国民党顽固派顾祝同、上官云相处，他们立即命令所有围剿部队开赴茂林四周。进入指定位置。

由于项英错误坚持改走“向南”的第三条路线，投入了顽军的包围圈。

这时，新四军军部派出的侦察人员发现附近周围山上有可疑情况，立即向军部报告。前沿哨兵抓获了两名形迹可疑的人。经反复查问，供出国民党顽军的军事部署，此时，项英像泄了气的皮球低着头，无话可说。叶挺早已敏锐地察觉到国民党顽固派企图堵截围攻我“向南”北移部队的阴谋。但是项英一意孤行的霸王作风，使叶挺也无可奈何。

军部召开了紧急会议，部署作战方案。叶挺对于国民党顽固派这一卑鄙行径无比愤怒，举起手杖一挥，严肃地说：“同志们，希望各部队加强团结，发扬猛打猛冲作风，争取全部人马冲出包围圈。”

部队按叶挺命令占领了出球岭等地，先头部队继续向前挺进，由于地形不利，被敌火力网封锁，部队受阻。叶挺、周子昆立即赶到前线，了解战情，勉励指战员英勇作战。按正常情况，军长到哪里，哪里就应是军部的指挥部，可根据情况实施指挥。但是直到此时，皖南部队的指挥大权仍然掌握在项英手中。叶挺有什么打算，亦无法直接下达。项英在百户坑主持召开紧急会议，讨论部队应何去何从问题，在会上，叶挺指出：“只有夺取星潭，我军才能突出重围。”这一作法完全符合党中央指示精神。但是项英在会上优柔寡断，犹豫不决，一直没有作出反应，拿不出好的办法。桌上钟表“嘀嗒嘀嗒地走着，时间一分一秒地浪费掉了，就这样延续了六七个小时，贻误了战机。叶挺心急如焚，怒火在胸中燃烧，激动地说：“时间就是胜利，不能犹豫不决了！我的态度，就是错误的决定我也服从，请项英副军长决定吧！”

最后，项英武断地否定了叶挺军长关于攻打星潭的命令，竟下令部队回原路，改向西南方向突围。

叶挺深知项英如此不负责任的随意改变行军路线，必将带来不堪设想的恶果。为了减轻损失，他无可奈何地布置了任务，部队由原路返回，向高岭方向迅速前进。军部亦于当晚撤离百户坑，转移到丕岭以西的星潭仓宿营。

却说军部向高岭进发的过程，因向导带错了路转了一圈又折回星潭仓。

因连夜行军，过分疲劳，项英决定休息一夜后，改向茂林方向突围，仍从铜陵、繁昌渡江。新四军迅速出击，控制了高坦。这时侦察员报告，上官云相发出总攻命令集7个师于茂林周围，全歼新四军。叶挺双眼噙泪，激动地说：“同志们，献身的时刻到了，宁愿站着死，不能跪着生。关键时刻，决不当逃兵！”战士们激奋地表示：“愿为革命流尽最后一滴血！”

高坦阵地的战斗激烈地进行着。顽军整连整营地疯狂向我军阵地扑来，新四军战士们视死如归，英勇顽强地打退敌人的一次又一次地进攻。叶挺见我军伤亡不断增加，决定甩开茂林之敌，改向东北方向转移，准备沿东流山麓经石井山、大康王，在经县、丁家渡之间渡过青弋江，由铜陵、繁昌渡江北上。事与愿违，转移途中，不断遭到敌人袭击，又加上下雨，山路泥泞，行军秩序十分混乱。一夜只走了20里，突围再无可能。计划一变再变，他们走进了石井坑。

石井坑，这个方圆只有五六里，住着十几户人家的小山村，四周是连绵起伏的山峰。

由于两天两夜的苦战，部队又没吃没喝，战士们极度疲劳，失散的人员较多。叶挺观察地形后，决心坚守石井坑与顽军血战到底。他命令部队作出决战前的准备工作，收容失散人员，整顿队伍，恢复部队的体力。可是只有十来户的小山村哪里有那么多的粮食？让战士们吃顿饱饭就很不容易了。叶挺看着战士们那极度饥饿疲倦的面孔，泪水模糊了自己的视线。他大声喊道：“把我的马杀了，分给战士们吃！”马夫嚎啕大哭地说：“不行啊！指挥官不能没有马！”不等马夫说完，只听“砰砰”两声，叶挺挥枪打死了心爱的战马。

正当叶挺奋不顾身地率领部队抗击国民党顽军围攻的时候，作为新四军主要负责人之一的项英，却临危动摇，产生出万念俱灰的悲观情绪，感到大部队突围无望，怂恿了周子昆、袁国平等几个人跟随自己一起，未与叶挺军长打招呼竟私自离队，企图从小路突围。这种不顾大局的逃跑主义作风涣散了军心，使部队处于非常混乱的状态。

叶挺接到了报告，压抑了多年的不满情绪似山洪爆发，他气愤地吼道：“逃兵、败类！”叶挺并没有因这事件的发生而感到畏缩和消极，他向中央发出电文，汇报了当时的情况。

毛泽东很快复电：一切军事、政治行动均由叶军长、饶濂石二人负责，一切行动决心由叶军长下。

这位久经沙场的北伐名将看着毛泽东的复电泪如泉涌，激动地说：“我决不辜负党中央的信任。”他毅然挑起了指挥全军继续突围北上与顽敌作战的重担。叶挺看着官兵们，站在高处激动地对大家说：“现在的情况十分危急，我们的处境非常困难。我们唯一的办法就是坚决杀出一条血路，冲出重围。只要大家团结一致，发扬勇敢顽强的精神，我们一定能打败敌人的进攻，突围出去。”

1月10日，顽军向石井坑紧缩了包围圈，顽军如潮水般涌来。在叶挺率领下，部队继续坚守石井坑，与敌人展开殊死战斗。新四军打退了敌军多次冲锋。敌人的大炮狂轰，把山上的竹林都炸成枯叶残枝，撒满山坡。战士们被炮弹掀起的泥土盖住了，把泥土拨开，爬起来继续战斗。坚守在东流山的勇士们，子弹打光了，就拼刺刀，刺刀戳弯了，就用牙咬，敌人逼近，他们就拉响手榴弹冲向敌群同归于尽，有的战士受伤了，仍坚持不下火线，重伤员们抱着敌人滚下了万丈深谷。其场面是何等壮烈！激战到12日，终因寡不敌众，东流山失守。

石井坑上空火光纷飞，电光弹交错，天空如同白昼，敌人借助火光，向军部逼近。面对敌军疯狂的进攻，叶挺临危不惧，奋不顾身地亲自指挥部队作战。他整天都坚守在战斗前线，观察战况。为指挥部队打退敌军的疯狂进攻和组织突围而操劳，连吃饭休息都顾不上。对叶挺这种为革命事业忠心耿耿的崇高品德，战士们都十分感动，当他从阵地回到军部指挥所时，大家不约而同地向他走过来。叶军长抬手拢一拢被风吹乱的头发，目光炯炯地扫视着大家，然后精神抖擞地放开洪亮的嗓音讲道：“同志们，目前的形势很清楚了。蒋介石卑鄙无耻，设下阴谋诡计，把我们围困在这里。但是，我们新四军顾全大局，坚持抗战，正义在我们这一边！为了抗日、为了人民，我们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干部听了叶军长的讲话，受到了巨大鼓舞，一致表示在叶挺军长领导下战斗到底。

12日夜晚，我军的伤亡越来越大，血流成河，石井坑的黄土已是一片紫红；石井坑失守了。

叶挺指挥部队边打边撤，退到了狮形山，立即召开干部紧急会议，叶挺难过而悲愤地说：“同志们，情况危急，为保留革命种子，现在开始突围，所有部队突围后的目标向苏北转移。”叶挺庄严而悲怆地说：“同志们，突围这场恶战就要开始了。此次转移，军部损失惨重，我叶挺有罪啊！”他声音哽咽地说：“我对不起党，对不起大家。希望大家想尽一切办法冲出重围，为革命保留种子。”饶漱石的心情也很难过，他安慰说：“军长，你何必自责，这个大祸完全是项英这个草包的责任！”叶挺激动地一一握了大家的手，此时一别，不知能否再见，大家都心情沉重，叶挺含着热泪祝大家突围胜利。

当晚八时，部队分散突围。突围开始了，战士们毫不畏缩，奋不顾身向敌人冲去。敌人把手榴弹掷过来，有的战士迅速拾起敌人的手榴弹又扔回去。有的战士子弹打光了，就插上刺刀

或抱着石头跳出掩护林，与敌人展开肉搏战。一些战士拉响了身上仅有的一个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阵地上处处流着鲜红的血，山坡上堆满了血肉模糊的尸体。只有2000多人终于经多次血战，从尸骨如山、鲜血淋漓的战场中冲出，他们历尽千辛万苦先后到达苏北和江北，成为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的幸存者。

12日晚上，叶挺率军部和教导队部分人员，离开了石井坑，向外突围，他们经过一夜苦战，转移到大康王西的地方。但大康王出口处已为顽军封锁，无法突围。此时，突然枪声大作，顽军向我进攻。大家在叶挺率领下，只好退到山上。顽军疯狂地向山上开枪扫射。叶挺军长毫不畏惧地就在山坡上观察敌情，子弹肆无忌惮地从他的耳朵边，头顶上飞过去，一些干部关心叶挺安全，劝他隐蔽一下。叶挺愤恨地说：“我不去，我要到重庆找蒋介石算帐去，要隐蔽，你们自己去！”

几天来，叶挺与大家一样，没吃过一顿饭。他吩咐警卫员把自己米袋里仅有一点米倒出来，交给炊事员煮稀饭，大家一齐吃，叶挺舍不得吃，让大家吃。警卫员请求叶挺自己把饭吃了，但是叶挺坚持不肯吃，最后每人分吃几口，才把这顿饭吃完。在如此困难危急时刻，叶挺依然关怀战士。

连日来，中共中央十分关注新四军北移部队和叶挺等人的处境，不断致电叶挺等人，询问部队的情况，勉励叶挺等继续坚持斗争，并表示党中央正积极设法营救他们。刘少奇、陈毅在江北也时刻关注着皖南部队的处境，研究如何增援事宜。

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周恩来在重庆向国民党蒋介石方面提出了严正抗议。同时向社会各界严正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皖南事变的阴谋。13、14日，中共中央一再致电叶挺等领导人，询问他们当前处境，并通报中央正与国民党方面交涉的情况。由于叶挺已下令将电台砸烂以便突围，因而无法收到中央的来电。

14日，叶挺、饶漱石仍被困在狭窄的山洼里，此处三面环山，唯一的出口被顽军火力控制，无法突围，处境非常危急。太阳升起来了，叶挺手举望远镜在寻找出路。突然，他的望远镜里闯入一个小点，渐渐地看清了，原来是一个人举着一面白旗边跑边喊：“同志们，我们都是中国人不该互相残杀，请派一位代表来谈判。”饶漱石提出，要下山与国民党当局顾祝同谈判，要求顾祝同让出道路给部队通过，到苏北抗日。叶挺表示坚决不去，但是饶漱石一再催促他去。饶漱石恳切地说：“军长，现在围兵重重，突围无望，留在这里只有死路一条，为了党的事业，为了战士们，也只有这一条路了。”他又严肃认真地说：“是啊，是党派你去的。我自应向党中央报告。”饶漱石抓住叶挺热爱党的事业的心理，一再催促叶挺去谈判。叶挺只好说：“为了党的事业，为了战士们，如果党决定派我去，我就服从。”然后，叶挺不顾自己的安危带着随员下山谈判，随即被顽军无理扣押。

叶挺走后，石井坑被敌军占领，新四军队伍被打散了，顽军到处搜捕、杀害新四军人员。许多干部战士在坚守阵地中，流尽最后一滴血，壮烈牺牲！鲜血染红了石井坑。

项英一行8日深夜不告而别后，由于道路不熟，夜色漆黑，他们转来转去，没有突出包围圈，又回到了军部。项英低着头，泪水止不住叭哒叭哒往下落，他愧对叶挺将军和战士们。8日前，他是那样威风，似乎新四军是他

项英一人的，一切由他说了算。而现在却成了归来的逃兵，权力不再属于他了，他长嘘短叹，心如刀绞，泪水不自禁地流出来，他愧对新四军战士们。

此后项英判若两人，他痛恨自己在军事上的无知，导致了战士们的流血牺牲。

项英、周子昆与叶挺、饶漱石由石井坑向大康王突围上山，在山上被顽军打散了。项英与军部副官刘厚总等隐蔽在树林里，巧妙地躲过了搜山的顽军，乘着顽军的空隙向原来突围的方向——石井坑、东流山方向移动。第三天黎明，在赵家村的一碳棚子里遇到李志高（军部科长）后又碰到周子昆及警卫员黄诚。一见面，大家都流下了眼泪。项英忏悔地说：“新四军失败，我要负主要责任，等回到延安，我一定向中央检查错误，听候处理。”这里的群众很同情新四军，见他们又累又饿，伤的伤，残的残，十分难过，立即烧火做饭，包扎伤员，打探消息。在老百姓的帮助下，他们很快找到了五团二营的营部，两股力量合起来共40多人，分散隐蔽在大山沟里。一个多月后，项英、周子昆等转移至丕岭下，在内覃仑附近的深山老林里隐蔽了一、二十天。

3月11日，项英、周子昆等转移到田坑里附近的莲坑，拂晓前就转移到田坑里沟尾子上。这里山腰有上下两个洞，小洞叫蜜蜂洞，只能容纳三、四个人，项英、周子昆、刘厚总和黄诚就住在蜜蜂洞里，下洞大一些，其他20多人住那里。

3月13日晚，项英、周子昆吃罢晚饭，对坐着用小石头下棋，过了不久，小洞口油灯熄灭了。警卫员黄诚睡在里面，然后是周子昆、项英。刘厚总为了保卫，总睡在外面。此时，刘厚总却睡不着，他看着沉睡的项英、周子昆，又望了望周子昆装经费的口袋，仿佛自己成了有钱的财主，妻妾成群的簇拥着，他陶醉了……他凶狠的目光环顾四周，此时一片寂静，正是下手的好机会。他迅速抽出手枪，朝正在沉睡的3个人身上“砰砰砰”地几枪。项英、周子昆当场毙命，黄诚脖子和肚子挨了两枪，肠子都流了出来，人昏死过去了。凶手刘厚总从项英、周子昆身上取走了经费、枪及项英的金笔、金表、仓惶出逃，向国民党顽固派投降。

项英被害时年仅47岁，周子昆40岁。战士们将项英、周子昆埋在洞外的山坡上做了记号。解放后，1955年5月，南京军区干部部的同志在黄诚的带领下到蜜蜂洞附近，将项英、周子昆的遗骸运到南京，安葬于南京雨花台革命烈士陵园。

项英在新四军工作期间，为新四军的发展做出一定的贡献，对皖南事变，项英不应承担全部责任。他也是这次事变的受害者和牺牲者。当然，项英在皖南事变中的过失，使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得以实现，未能使新四军皖南部队的损失缩小在有限范围内，这是后人值得认真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的。

项英在革命斗争中功大于过，称得上一个革命家，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和革命烈士。

皖南事变给新四军造成了巨大的损失。皖南新四军 9000 人除 2000 人突围外，其余 6000 余人大部分壮烈牺牲，一部分被俘。军长叶挺被扣押，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副军长项英、副参谋长周子昆被叛徒杀害，这就是震惊中外、骇人听闻的皖南事变。

五、正义之矛讨顽凶

蒋介石卑鄙无耻地一手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江南奇冤——皖南事变后，竟然颠倒是非黑白，编造谎言，诬蔑新四军所谓“扰乱战局”、“阴谋不轨”等，悍然于1月17日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名义发布“通令”，宣布将新编第四军全部解散，并撤消新编新四军番号，竟然扬言将军长叶挺革职，交军法审判，依法惩处。

对于蒋介石国民党顽固派一手制造的皖南事变的滔天罪行，中共中央采取了坚决反击的方针。1月18日，中共中央发言人就皖南事变发表了谈话。“谈话”深刻地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一手炮制的皖南事变的真相，“谈话”还强调指出3年以来，新四军转战大江南北，抗御强敌，屡立奇功，不但国人尽知，也为全球所共见。但是国民党顽固派竟然乘新四军皖南部队遵令北移的时候，对其围击聚歼，公然践踏军纪国法，反过来又贼喊捉贼，竟然诬蔑新四军为“叛逆”，正式发出通令，要取消新四军番号，将叶挺军长交付军法审判。“一篇堂皇文告，已将其阴谋消灭抗日部队的真面目，赤裸裸表白于天下”。“谈话”同时严正提出，严惩阴谋消灭新四军皖南部队的罪魁祸首，释放所有被俘的新四军将士，保障叶挺军长等军政干部生命安全等9项要求。

国民党顽固派的罪恶阴谋被揭露后，激起了中外人士的莫大愤慨。苏联、美国、英国指责蒋介石不打侵略者，收复国土，反而把枪口对准抗日有功的新四军，呼吁立即停止内战，以团结为重，驱赶日本侵略者。

还在皖南事变发生期间，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等上书蒋介石，要他“悬崖勒马，贯彻孙总理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蒋介石1月17日反动命令发表后，各界人士纷纷致电国民政府，严正要求释放叶挺将军，撤销反共部署，共同抗战。

国内各地人民群众、团体及海外华侨亦纷纷谴责国民党顽固派制造骇人听闻的皖南事变的罪行。《快邮代电》、《上海周报》等报，发表了赞颂新四军转战大江南北、英勇作战的功绩，谴责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反共阴谋，强烈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收复国土。

蒋介石在策划这场皖南事变之前，曾预想到会遭到中共的指责，对全国人民甚至自己党内有如此强烈的反响，特别是国际舆论的如此尖锐，是始料未及的，蒋介石此时焦头烂额。就在此时，传来了共产党在江苏盐城成立新四军新军部的消息，这消息犹如晴天霹雳，把蒋介石震呆了，颓丧地呆坐那里，半晌，口中喃喃地说：“军部不是消失了吗？新四军不是被解散了……”

为了摆脱因制造皖南事变而招致中外人士的强烈谴责的困境，蒋介石企图通过即将在重庆召开的第二届国民参政会来扭转局面，挽回面子，转移视线，掩饰其掀起反共、分裂国共合作的真实面目，千方百计诱骗中国共产党参议员出席会议。参政会是何种机构？为何要共产党参加？在抗战初期，蒋

介石迫于全国民主势力的压力，同意由国民党、共产党、职教社、救国会、第三党、青年党、国社党等十几个党派组成一个咨询、协调各党派的机构，又称国民参政会。针对蒋介石这一阴谋，中共中央提出了包括释放叶挺回任军长在内的 12 项条件，要求蒋介石接受，作为出席参政会的前提，国民党根本不敢接受。中国共产党断然拒绝参加，从而在政治上给予蒋介石以沉重打击。

六、重整旗鼓战日顽

为了回击蒋介石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阴谋，抵制蒋介石妄想取消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中共中央决定重建新四军军部。1月20日，中共中央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委，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同日，中共中央又发布了成立新四军军分会的任命通知，刘少奇为军分会书记，邓子恢在安徽工作，以饶漱石为代理政治部主任。新四军由4个支部扩大为7个师，完全脱离了国民党当局的羁绊，不再属于国民党的哪个战区的序列，亦不再需要国民党来发放饷弹，在敌后广阔天地里纵横驰骋，狠狠打击敌伪军。

1月23日，新四军代军长陈毅、副军长张云逸等正式宣布就职。1月24日，陈毅在《江淮日报》发表就职通电，表示本人就任代理军长，统率全军9万之众，誓与日寇汉奸反共投降派奋斗到底。

25日下午，新军部成立大会在江苏盐城的游艺园内举行，会场上布置得庄严而又隆重，主席台上横挂的是“指挥若定”，“义旗高举”等鲜红的锦旗。各党派人士、各阶层代表济济一堂气氛十分热烈。当刘少奇、陈毅等领导登上主席台时，会场上欢呼雀跃，群众热烈的高呼“拥护党中央重建军部！”“拥护陈代军长！”等口号当刘少奇宣读了中央军委关于重建军部和新军部领导人的任命命令后，整个会场沸腾起来了，报以雷鸣般的掌声。接着陈毅发表就职演说，他说：“今天在这里举行庆祝新四军新军部成立大会，这在中国革命史上以及将来都是一件大事。我想只要是抗战的爱国同胞，听到新四军新军部的恢复，一定会欢迎、拥护的，仇恨的只有日本帝国主义，反共顽固派与亲日派。因此，今天军部的恢复，是直接有利于国家民族前途的。”陈毅坚定不移地说：“我们前面还有很多困难和风险，只要我们坚持斗争，最后胜利是属于我们的！”会场响起雷鸣般掌声，激励着每个新四军战士，鼓舞着每一位爱国志士。

接着刘少奇讲话，痛斥了国民党顽固派的破坏团结抗战，发动皖南事变的滔天罪行，深刻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制造分裂，妄图投降日寇的阴谋。他号召全军坚决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服从党中央领导，做好准备，随时粉碎顽固派的任何阴谋。

1月28日，陈毅收到中共中央军委任命新四军各师军政负责人的指示。随后，将陇海路以南的新四军、八路军9万余人统一整编为7个正规师和1个独立旅。第一师兼苏中军区：师长粟裕，政委刘炎，政治部主任钟期光。第二师兼淮南军区：师长张云逸兼，政委郑位三，后为谭长林，副师长罗炳辉（后为师长），参谋长周骏鸣，政治部主任郭述申，副主任张劲夫。三师兼苏北军区：师长兼政委黄克诚，参谋长彭雄。四师兼淮北军区：师长兼政委彭雪枫，不久，政委由邓子恢兼，参谋长张震，政治部主任肖望东。五师兼鄂豫皖军区：师长兼政委李先念，参谋长刘少卿，政治部主任任质斌。六

师（在苏南）：师长兼政委谭震林，参谋长罗忠毅。七师（在皖江区）：师长张鼎丞，政委曾希圣，政治部主任何伟。独立旅：旅长梁兴初，政委罗华生，政治部主任刘兴元（该部于1942年秋奉命由淮海区北上山东归一一五师建制）。盐城重建军部后的政治部主任邓子恢；组织部副部长张凯；宣传部部长钱俊瑞；除奸部部长汤光恢，副部长梁国斌；敌工部部长刘贯一，副部长李亚农；供给部部长宋裕和；卫生部部长沈其震，副部长崔义田；江淮日报社副社长王澜西。

新四军军部在盐城的重新组建，使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消灭新四军的企图完全破灭，他们把新四军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日本帝国主义狂叫要“完成皖南事变未完之功”。妄图乘新四军还未缓过气的时候一举消灭我新四军。

1941年1月下旬，盘驻在镇江地区的日军第12旅团移到苏中沿江和运河沿线，并侵占了黄桥镇。与此同时，卖国求荣的国民党反动派也想借此机会彻底打垮我新四军。在蒋介石的部署下，韩德勤部准备从背后偷袭我盐城军部。早有降日之心的李长江这时也跳出来，准备公开投敌，配合日本鬼子进攻新四军。

刚刚受到沉重打击的新四军勇士们又面临一场保卫军部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的严酷斗争。经过残酷的战火洗礼的新四军将士团结一心，同仇敌忾，决心给日伪军以迎头痛击。

2月上旬，日军以盐城我新四军军部为主要目标，向我苏中、苏北根据地开始大规模“扫荡”，并向扬州、高邮、南通等地集结兵力。

2月15日，无耻汉奸李长江在泰州公开投敌，当上了伪军第一集团军总司令，把自己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为了打击日伪的嚣张气焰，给李长江当头一棒。陈毅、粟裕于18日指挥新四军第一师的官兵从隐蔽集结的地区出击，沿公路向西猛攻敌人，早已气炸了肺的勇士们英勇出击，第二旅首先打下了姜堰镇，第一、三旅也迂回包围了泰州。刚刚当了8天总司令的李长江惊慌失措，只好凭借城内坚固的雕堡工事作最后的抵抗。我新四军健儿们避开敌人的火力，在夜间派小部队摸进城内，直捣李长江的集团司令部，李长江吓破了胆，连忙翻后墙逃窜而去。李长江一逃，城里的敌人失去了指挥，就像没头的苍蝇，乱成一团。在我军的突然袭击下，敌人的防线很快瓦解，敌人死的死，逃的逃，侥幸余生而又来不及逃跑的只好举手投降。20日早晨太阳东升之时，我军的军旗已高高飘扬在泰州这座古城上空。这一仗彻底歼灭了李长江的主力，俘虏其官兵5000余人，缴获武器弹药不计其数。

就在我军袭击泰州之时，日军为了执行其“扫荡”计划，于2月18日突然由扬州、高邮、黄桥、如皋等地同时出巢，乘我主力讨伐李长江之机占据了海安，东台等地区，并虎视眈眈地盯住盐城。同时，派一支部队急速向泰州扑来，企图从背后偷袭我军，以解救李部。而同时，国民党的韩德勤也乘机以三个团的兵力侵占我盐阜区的部分地区，企图乘日军“扫荡”之机进入

我抗日根据地。面对这种局面，已经完成讨伐李长江，打击日伪气焰任务的新四军，为了保存抗日力量，避免同装备精良的日伪军正面作战，于2月21日主动撤离了泰州，按预定计划深入敌后，反击日伪的疯狂扫荡。

1941年3月，像没头苍蝇东扑西撞了一个多月毫无收获的日军又先后派出3个旅团和几个联队，以充当炮灰的伪军开道对我苏中根据地进行反复“扫荡”，先后占领东台、兴化等一些城镇。但由于新四军发动人民群众坚壁清野，敌人得到的只是几座空城。

7日，日军抽调了五、六万人的精锐部队以几十艘装甲汽艇等大量装备分几路向我阜宁、盐城进犯，妄图一举扑灭新四军军部，侵占和摧毁我苏中根据地。狡猾的敌人趁夏季江淮河水猛涨冲走我军布设在河里的水雷和木桩的时机，开动装甲艇，在密如蛛网的河川地区横冲直撞，用小钢炮、机关枪向我根据地乱放乱扫。为了寻找我军主力，敌人派三架一组的侦察机在空中来回飞窜，地上的骑兵和野战部队也拉网般来回搜索。但是在我军严密的布防下，敌人什么也没有得到。

面对日伪这样大规模的“扫荡”，新四军和抗日群众在陈毅军长和刘少奇政委的指挥下，沉着应敌。他们首先把主力部队分散隐蔽起来，把军部直属机关，如抗大五分校、华中党校、鲁艺华中分院、江淮日报等部门的非战斗人员、伤病员及老弱妇孺都分散转移。没有后顾之忧的主力战斗部队避开敌人的锋芒，充分利用游击战的方式，运用声东击西、南攻北守、首尾夹击、打伏击、夜战偷袭等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与日伪周旋，使数倍于我军的日伪军想打找不到对手，想袭击却连连扑空，每到一地，在我军的打击下反而顾此失彼，被动挨打，连战皆败。

与此同时，在山东的新四军第一师为了配合军部和主力部队反“扫荡”作战，也发起了进攻，围困泰州、泰兴和姜堰之敌，并攻克了天星桥、孤山、黄桥、古溪等敌伪据点，并不断袭击南通，如皋境内的敌伪据点和盐城至东台的交通线，迫使敌人大部兵力从盐城、阜宁地区仓皇南撤。第三师的两个主力团也配合第一师的行动，先后攻占湖垛、上冈。日伪军眼见“扫荡”根据地每战皆败，自己的“根据地”又岌岌可危，于是只得放弃“扫荡”苏中，将兵力北调，这样，东奔西突了一个多月的日伪“扫荡”部队，除了损失3800多人，在江淮河湖中沉下30余艘汽艇外一无所获，又夹着尾巴在苏中根据地抗日军民的欢庆锣鼓中缩回去了。

在苏中根据地抗击日伪疯狂“扫荡”的同时，国民党反动派则加紧通敌、投敌，加紧对我华北、华中抗日根据地的进攻。

皖南事变后，蒋介石为了实现其“驱逐”新四军北渡黄河，以配合日军聚而歼之的罪恶目的，乘日伪“扫荡”苏中根据地之机，调集30万反共大军向我华中根据地进攻，其矛头直指我第四师和豫皖苏边区。

蒋介石出动豫东、皖北的第二十军、骑兵第二军、骑兵第八师，并从豫西调来汤恩伯指挥的第三十一集团军所属的第九十三军和第八十五军的第二

十三师，以总共 14 万兵力向我扑来。与此同时，李品仙、顾祝同也分别向我鄂中、皖中、皖东根据地发动猛烈“清剿”。在苏北的韩德勤也蠢蠢欲动，准备配合汤恩伯的行动。面对这种形势，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作出了坚决反击反共投降势力，确保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决定，部署第四师全部坚持驻守豫皖苏地区，阻止汤恩伯向东推进；第二、七师主力分别坚守在淮南津浦路西和皖江根据地，防范桂系反动派的侵犯；第三师主力继续在盐阜、淮海区密切监视韩德勤部的动向，牵制其行动；而第一师的主力则迅速占领苏中的战略要地，并隐蔽集结，待机歼灭国民党反动军队的来犯。

我军刚刚部署完毕，1941 年 1 月中旬，一意孤行的汤恩伯开始了他的倒行逆施，向我根据地发动攻击，其先头部队推进到涡河以南。4 月初，敌军兵分三路分别由张村铺、王市集、江口集等地向我军发起猛烈进攻。一时间，烽烟滚滚，炮声隆隆，整个战场被污烟覆盖。受战火煎熬的村庄和大地发出阵阵呻吟，仿佛在控诉国民党反动派的滔天罪行。

面对疯狂的敌人，我新四军指战员冒着枪林弹雨，浴血奋战，他们前赴后继，奋勇杀敌，决心给反动派以顽强的回击，但是敌人装备精良，人数众多，像蚂蚁一样向我猛扑，反击战打得十分艰苦。敌人倒下一批又冲上来一批，我军以英勇顽强的斗志同敌人搏斗。子弹打完了拼刺刀，刺刀打弯了找木棍，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被我打退。后终因伤亡过大，新四军勇士们被迫放弃涡河以南地区，含着热泪离开洒满战友鲜血的土地。一曲曲悲歌直冲霄汉。

紧接着，敌人又分三路北渡涡河，向我大举进犯。无耻的国民党为了消灭我新四军不惜策动敌伪向我淮上地区“扫荡”，而且指使土匪和反动封建会道门势力在我后方发动暴乱。我军面临严重局面。一方面要打击敌伪的“扫荡”，一方面还要抗击来犯的国民党军队。在涡北万楼，我军与汤匪的部队展开激战，装备落后，给养困难的新四军勇士们凭着惊天地动鬼神的民族气概同敌人战斗。最后，敌人终于以优势兵力突破我军防线，深入到龙山集、擅城集地区，并且向隐藏于小营集的我军进行大规模迂回进攻，我军被迫退到北淝河以北的狭长地带，陷入了日、伪、顽反动军队的夹击之中。在这种情况下，我第四师第十二旅、十一旅及大批地方干部于五月间分 3 批转移到津浦路东，保存实力，坚持和巩固皖东北根据地。

汤恩伯集团侵占了我豫皖苏边区后，又妄图继续东犯我苏北根据地。韩德勤为了策应汤匪东犯，在 7 月间乘日军向我苏北地区“扫荡”之机，以保安“第三纵队的两个团侵占了我泗阳西北的重要战略要地陈道口，并派遣第一一七师、三十三师先后抢占了我淮阳、涟水间的大兴庄，张官荡等地，企图以陈道口为中心，控制运河两岸，在我淮北、淮海根据地打开一个走廊，一方面阻碍我军的行动，另一方面为汤匪东犯准备一个通道。当然这只是韩德勤的一厢情愿，我抗日军民决不可能让国民党反动派在我抗日根据地上横行。

陈道口是个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集镇，国民党反动军队为了固守这一阵地，修筑了坚固的围寨工事，挖掘了纵横交错的壕沟，布置了密如蛛网的堡垒，以强大的轻重武器形成了交叉火力，加上这里是一块平地，四周开阔，无遮无挡，周围虽有一些青纱帐，但不足以隐藏大队人马。虽然如此，为了粉碎汤恩伯继续东犯的阴谋，保卫根据地人民的生命财产，我新四军决定争取时机，强力攻占陈道口，拔掉这颗埋在我根据地的钉子，打乱国民党的如意算盘。然后再集中兵力，对付并歼灭向东进犯我抗日根据地的反动军队。

为了保证这一仗的胜利，代军长陈毅下决心集中3倍于敌的兵力，亲临前线，直接指挥这次战役，以期用强大的火力一举歼敌。陈毅军长布署所属军部独立旅及第四、第七旅各一部分共6个团的兵力作为抢占陈道口的突击兵团，并在皖东北地区集结了第五旅、第九旅的主力部队，准备阻击向东推进的汤恩伯部。同时，在淮阴以北地区布置第十旅及骑兵团，在淮阴与涟水之间布置了第八旅，以阻击韩德勤可能派出的增援部队。而宿东游击支队则迫近津浦路以灵活机动的战术扰乱敌人，迟滞东进之敌的速度。

一切布置完毕，只等一声令下，整个战役将全面打响。在战斗发起之前，陈毅代军长到前线进行了实地勘察，检查战斗布置情况，鼓舞战士斗志。他在担任主攻的第十九团进行了战前动员。他风趣地对战士们说，你们团天不怕，地不怕，当然也不怕国民党反动派，害怕的是那个王志夏（顽军保安第三纵队的司令）。他给战士们讲了形势及这次战役的重要性，随后说，现在陈道口集结了许多顽固派的反动部队，也修筑了很多坚固的工事。很明显，他们是想割断我们淮北两个抗日根据地的联系，为汤恩伯东犯作跳板，真是白日做梦。说着，他一拍桌子，操着浓重的四川口音说，这些卖国求荣的顽固派太可恶，也欺人太甚，我们不打则已，要打就一定要胜利。陈毅最后提高声音问大家，你们担任主攻，有没有把握彻底消灭陈道口的敌人？战士们齐声回答：有！响亮的回答声给顽军敲响了丧钟。

10月14日，进攻陈道口的战斗打响了，陈毅来到离顽军前沿300多米的第十九团指挥所亲自指挥。为了增强主攻团的突击力量，他把军部仅有的一个山炮连配给十九团。战斗发起后，山炮连的大炮开始怒吼，炮弹呼呼地砸向敌人阵地，敌人费尽心机修筑起来的工事转眼间被炸上了天，炮声中夹杂着被炸敌人哭爹喊娘的嚎啕。战役开始的前两天，我军完成了对陈道口的包围，驻守之敌已成我瓮中之鳖。敌人的外围据点一一被拔。第三天，我军向陈道口中心地带的敌军发动总攻，早已憋足了气的勇士们怒吼着在敌人的炮火中勇往直前。敌人凭借深沟高垒死守顽抗，我军攻势受阻，战斗打得非常激烈。担任主攻的第十九团大胆地使用山炮抵近射击，一下子就摧毁了敌人的许多工事，打开了突破口，后续部队在嘹亮的军号声中冲进陈道口，攻占了敌人的心脏地带。“缴枪不杀”的喊声此起彼伏。侥幸没有葬身枪下的敌人都乖乖地举手投降，近千名顽军成为了新四军的俘虏，在战斗进行的同时，我军打援部队成功地攻克了大兴庄，击溃了自曹甸地区出援的敌人。

紧接着，我军乘混乱之机，扩大战果，又横扫了沐淮涟、邳睢铜、淮泗等地区的顽匪武装，彻底清除了盘踞在我抗日根据地的顽军。

陈道口战役的胜利，不仅沉重地打击了韩德勤顽军，也粉碎了他妄图接应汤恩伯东犯的阴谋，极大地巩固了我淮海和皖东北根据地。

随着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我中原新四军各师取得一连串反“清乡”斗争的重大胜利，把苏、鲁、皖、鄂、豫连成一片，不断开创华中地区抗战的新局面。

为了执行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提出的扩大解放区，缩小敌占区的战略任务，新四军各部队从1945年初开始，连续发动了春夏季对日攻势作战。

第三师兼苏北军区部队，自1月至3月，歼灭伪军和日军1200余人，先后攻克敌据点20余处，解放了灌河以北广大地区。4月，集中11个团共1.4万人的兵力发起阜宁战役，歼灭伪军2400余人，解放阜宁城及市镇22个、村庄560余处。随后，继续发动攻势，又解决了盐阜以东地区，并控制了东（海）淮（阴）公路和盐河，使淮海根据地扩大一倍。

第一师兼苏中军区部队，于2月下旬发动攻势，相继攻克沙沟、崔垛等5个据点、歼伪军900余人。4月下旬，又以3个团的兵力，在三垛、河口三间设伏，经4个小时激战，歼日伪军1800余人，其中毙伤日军240余人。5月，攻克淮安西南的日伪军据点多处。

第二师兼淮南军区和第四师兼淮北军区部队，于2月至4月粉碎日伪军打通淮河交通线的计划后，为进一步扩大攻势，组织兵力对敌人进行有力反击。至6月，先后举行了宿南、睢宁战役，相继攻克泗阳、睢宁县城及大店、虞姬墓、卓海子、邱集等据点21处，共歼日伪军7000余人。

第五师兼鄂豫皖湘赣军区部队，于4月上旬，集中主力6个兵团，向随县南和信（阳）西南的敌后方挺进，打得敌人措手不及，恢复了白北山和四望山抗日根据地。7月至8月，又粉碎了国民党军顽固派对四望山根据地的军事进攻，并扩大了泌阳、桐柏、信阳、随县等地区。

第七师兼皖江军区部队，根据华中局关于今后主要是向江南发展的指示，于4月对芜湖地区之敌发起攻势，收复部分土地。7月上旬，一度收复至德县。

新四军在1945年春、夏季攻势作战中，共歼日伪军16万余人，扩大解放区24万余平方公里，解放人口近1000万，使华中各抗日根据地基本连成一片，为转入战略反攻创造了条

经过一年来的局部反攻作战，中国敌后战场形势越来越好，力量增强，解放区扩大，敌占区缩小，迫使侵华日军退守铁路沿线，日益孤立，面临灭亡。加上德国投降，美军向日本投掷原子弹，苏联向中国东北出兵，使日本加快灭亡。在此形势下，毛泽东主席发出《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指示，朱德总司令连续发出7道命令，要求解放区军民立即举行战略反攻，消灭侵略

者，收复失地。接到这些指示和命令后，华中地区军民立即进行紧急动员，党政机关以支援部队作战为中心任务，同时做好开辟新区和接管城市的准备，主力部队迅速补充兵员，地方武装升级，苏中地区在很短时间内编组了17个步兵团；群众掀起了参军、参战的热潮，纷纷组成“反攻团”，配合部队作战，并迅速组成支前大军，支援前线。

向敌占城市和交通要道进攻。从8月9日到22日，华中军民在大江南北解放县城17座，重要市镇近200个，歼灭日伪军1.2万余人，获得了战略反攻的初步胜利。

向中小城市和广大农村进军。战士们如旋风般直冲日伪军碉堡和营房、枪声、刺刀撞击声传遍四方，杀声四起，“不许动，缴枪不杀”的喊声惊天动地，敌人慌作一团，纷纷溃逃，举枪交械。正在敌后战场节节胜利之机，蒋介石却命令其部队向解放区进攻。在此形势下，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于8月24日指示新四军，应尽快占领南京、太湖、天目山之间许多县城，创造纵横数百里的广大根据地，迅速占领辽河、串场河（阜宁一线）沿线各城市，使苏中、苏北、淮南、淮北打成一片。据此，新四军各部队加紧进攻中小城镇之敌。从8月24到9月22日，华中军民解决县城15座，重要市镇200余个，歼日伪军1.2万余人。

在日本政府已签署投降书，而在华中日军拒不投降的情况下，新四军继续举行攻势作战。8月26日至9月22日，第三师和苏北军区部队进行两淮（淮阳、淮安）战役，歼伪军1.3万余人。同时，苏中、淮北、淮南军区部队攻克泰兴、如皋、灵璧、萧县城等据点多处。10月31日至11月11日，苏中军区部队进行盐城战役，全歼伪军两个师，俘1万余人。12月19日至26日，华中野战军第七、第八纵队进行高邮战役，歼日军1000余人，伪军4000余人。此后，又发起陇海铁路东段战役，既给顽抗的日伪军以沉重打击，又使华中解放区和山东解放区连成一片。

在8年抗战中，新四军对日伪军作战19374次，毙伤日伪军134731人，俘日伪军163380人，不仅削弱了日军向正面战场推进的势头，而且限制了日军南进太平洋的范围，支持了国民党军和盟军的对日战。

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战绩显著，业绩惊天动地，气壮山河，为中国革命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七、凛然正气贯长虹

中国人民经过 8 年浴血奋战，终于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为了争取在抗日胜利后建立一个独立、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1945 年 8 月 28 日，中国共产党委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从延安飞抵重庆，与国民党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

谈判过程中，毛泽东、周恩来一再与蒋介石交涉，要求立即释放叶挺及其他被国民党囚禁的政治犯。9 月 2 日，毛泽东向国民党方面提出了八项原则意见，其中包括“应释放一切政治犯，并列入共同声明中”等内容。经过中国共产党的艰苦谈判斗争，10 月 10 日，迫使蒋介石在《会谈纪要》（双十协定）上签字，承认在国内实行政治民主化和人民民主权利。但是会后蒋介石国民党迟迟不执行《双十协定》，依然拒不释放叶挺及其政治犯。

1946 年 1 月间，由国民党、共产党以及其他党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于重庆召开。会议开幕前，12 月 18 日，周恩来在重庆中外记者招待会上提出：《双十协定》中双方获得协议并应付诸实施的许多的项目，如保障人民自由、释放政治犯等等；国民党政府应向政治协商会议提出报告，并希望政治协商会议对于这个协议的实施，加以督促。在会议期间，中共代表团继续就释放叶挺及其他政治犯等问题与国民党进行斗争。国民党当局假意表示政治犯于 7 日内调查明确，除汉奸及确有危害民国之行为者外，分别予以释放。

政协会议以后，中共中央为争取叶挺的释放，继续作不懈努力。中共中央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了以释放 1945 年 9 月邯郸战役中被俘获的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官兼四十四军军长马法五换回叶挺的要求。在全国人民的强烈要求和中国共产党不懈斗争下，蒋介石迫不得已，接受了这个条件，终于正式答应释放叶挺。

叶挺军长被俘后，国民党为了瓦解他的斗志，施展了各种卑劣伎俩对他进行威逼利诱，顾祝同亲自设宴，以“好朋友”、“同学”（他与叶挺同是保定军官学校学生）的身分，对叶挺进行劝降，并以“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的地位来引诱他。但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叶挺大义凛然，马上戳穿了他们的把戏，并立志：“叶挺头可断，血可流，志不可屈！”他那首著名的囚歌，成为一个坚强战士浩浩正气的真实写照。

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
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
一个声音高叫着：
爬出来啊，
给你自由！
我渴望自由，
但也深知道，
人的躯体哪能由狗的洞子爬出！

我只能期待着那一天，
地下的火冲腾，
把这活棺材和我一齐烧掉，
我应该在烈火和热血中得到永生！

1946年3月4日，被扣押长达5年之久的叶挺，终于获释，光荣出狱了，出狱那天，国民党当局送来一套呢质军服，让他穿着离开，叶挺鄙屑地说：“我不穿，我要穿新四军的军装。”

当天下午，叶挺来到了重庆，红岩中共代表团住处，受到了董必武、王若飞、邓颖超、廖承志等人的热烈欢迎。人们事先写了一批“叶挺将军是人民军队的光荣”、“欢迎叶挺军长”等标语，叶挺的女儿扬眉知道爸爸出狱，高兴得一夜都没睡，制作了一朵红花，写了“欢迎爸爸”的标语，与大家一起去迎接父亲的回来。叶挺在一片爆竹声、欢呼声中回到了人民的怀抱，激动地和大家握手拥抱。叶挺对一些闻讯赶来的新闻记者说：“中国人民的事业，不是哪一个党哪一派可以做完的，希望大家来为民主团结而努力。”他严正要求国民党当局释放其他被扣的新四军干部战士。

叶挺获释的消息传开后，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无不为之欢欣雀跃，重庆《新华日报》和延安《解放日报》均以显著的位置发表了叶挺将军获释的消息：“叶挺将军已于4日下午6时被释放，叶将军身陷囹圄，5年于兹，受尽法西斯特务之摧残折磨。但叶将军仍精神愉快，决心为民主事业努力。他并希望国民党当局释放其他被扣的新四军干部战士。”

《解放日报》还发表了《欢迎叶挺将军》的专文。文章说：“在全国人民的热烈期望中，叶挺将军终于出狱了。这位献身于两次伟大的中国革命战争（北伐战争和抗日战争），创造了许多英勇的胜利的战绩，为中华民族，中国人民立下了极大的功勋的英雄，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手里曾遭受五六年的折磨，头发也花白了，灰黑的军服很旧，两肘处已经破损，不仁的待遇在他身上打上了深刻的烙印。但反动派没有达到自己的愿望，他们没有能够把叶挺将军加以污辱和谋害，而且相反地，由于叶挺将军的坚强不屈，全国人民与民主人士的声援和民主运动的高涨，叶挺将军终于被释放了。全国人民欢迎叶挺将军出狱，因为他的出狱表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增加了一份巨大的力量。”

自从叶挺将军被无理扣押后，广大新四军指战员都惦念着自己所敬爱的军长，衷心盼望他能早日重获自由。正如在皖南事变中脱险的文化界著名人士钱俊瑞所说的：“我挂念着叶军长，挂念着他那英勇美丽的灵魂。我盼望他在最短期内重新获得自由。他的爱和恨就是我伟大民族的爱和恨。他热爱着祖国人民。他的自由是我伟大祖国获自由的重要保证！”这一席话，完全表达了广大新四军战士以及全国人民的共同心声。

如今，新四军全体指战员怀着十分兴奋激动的心情，热烈欢呼叶挺军长得到释放，重获自由。3月7日，新四军代军长陈毅、副军长张云逸代表全

体将士致电叶挺军长，表示亲切慰问，电文如下：“皖南事变，将军身陷囹圄，正义不屈，5年冤狱，饱受摧残，海天怅望，天任关注。现闻将军已恢复自由的消息，全军将士悲喜交集，谨电慰问，早日返部队主持为盼为禱。”3月9日，新四军总部为庆贺叶挺出狱，特意举行晚会，到夜11点尽兴而散，参加会的同志们热烈地盼望军长早日返部，统率全军，为和平民主事业而奋斗。

华中军区司令员张鼎丞、政治委员邓子恢等率领华中新四军全体指战员也致电叶挺军长，对他光荣出狱表示热烈祝贺：“自皖南后，每个同志都时刻关心你的安危，现闻你已恢复自由，全军欢跃。5年来你受尽了磨难，然而你的正义之气势发扬了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振奋了我们在敌后的斗争意志，使反动派的阴谋完全落空，皖南后，我军在党中央华中局正确领导与军首长坚强指挥下，坚持了华中的抗战，直至反攻开始，力量已加倍壮大。现和平民主已见端倪，而反动派尚正在阴谋破坏的时候，我们盼望你能迅速回部，率领我们共同完成整军方案，促成中国和平民主大业之完全实现。”

一批著名文化界人士，名流学者喜悉叶挺光荣出狱的消息，联名致电叶挺，祝贺他释放出狱重获自由。

中共代表团在重庆为叶挺光荣出狱举行了欢迎会。会上，大家频频举杯为叶挺祝贺。叶挺衷心感谢党中央对自己的关怀。他在宴会上激动地说：“在这5年里，我总结了过去的经验，我认识清楚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人民走向一个和平、民主、独立，富强的国家，也只有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才能正确地指导中国人民走向一个和平、民主、团结的局面。”他在会上表示自己要继续为人民的解放事业而努力斗争，恳切地要求党中央立即给自己分配工作。

叶挺出狱时，周恩来正在延安汇报工作，不在重庆。3月6日，周恩来从延安来到重庆叶挺知道后，赶往机场迎接。周恩来一下飞机叶挺就快步迎上来，两人紧紧地拥抱着。叶挺主动地向周恩来汇报皖南事变的经过及惨痛教训，沉痛检讨自己在皖南事变中的责任，并请求党中央尽一切努力，继续与蒋介石交涉释放新四军被俘人员，周恩来亲切地慰问了他。

叶挺出狱的第二天，立即致电中共中央，请求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电文如下：

我已于昨晚出狱，我决心实行我多年的愿望，加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在党的领导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贡献我的一切。我请求中央审查我的历史是否合格，并请答复。

党中央对于叶挺的一贯表现十分了解，立即决定接收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3月7日，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定稿，党中央复电叶挺。电文如下：

亲爱的叶挺同志：

5日电悉，欣闻出狱，万众欢腾。你为中华民族解放与人民解放事业进行20余年奋斗，经历了种种严重的考验，全中国都已熟知你对民族与人民的

无限忠诚。兹决定接受你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党员，并向你致热烈的慰问与欢迎之忱。

叶挺接到了中共中央的复电后，心情特别激动，向报社记者发表谈话，回顾了自己30多年来不断摸索真理、追求革命的历程。并讲述了自己为什么请求重新入党的原因。他说这是自己在失去自由的5年多时间里，有很多时间来回顾自己过去所走的路程得出的结论，认为只有中国共产党的同志才能贡献其全部力量为中国人民来工作，自己在失去自由的环境中更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所以我就下了这个决心：如果我日后能自由了，就一定要继承牺牲了的同志们的革命精神和事业，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把自己的全部力量贡献给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叶挺的谈话言情诚挚，高风亮节，真是感人肺腑！

叶挺重新回到了党的怀抱，觉得自己身上顿然增添了无穷的力量。他向党宣誓：决心继续为共产主义伟大事业作毕生奋斗。

清明节那一天，叶挺夫妇偕女儿扬眉，与邓发、廖承志夫妇等一行人，外出为烈士扫墓。

叶挺不顾身体的虚弱，主动向党要求分配工作，并积极地完成。他作为共产党方面的代表，参加当时国共谈判的3人军事委员会的工作。他还时常参加重庆各民主党派和爱国人士的集会及有关活动，揭露国民党准备挑起全面内战的阴谋，以及国民党反动派迫害爱国人士的滔天罪行，要求国民党当局释放一切政治犯。他为在中国实现真正的和平民主而不惮疲劳地四处奔走。

4月初，叶挺接到了中共中央的通知，到延安参加整军工作会议。他决定于8日与王若飞、博古、邓发、黄齐生以及他的夫人李秀文、女儿扬眉、儿子阿九等人一同乘飞机前往延安。

8日上午，叶挺一行乘飞机途经西安，飞往延安。不幸的事情发生了，8日那天，叶挺他们所乘飞机，飞抵延安上空后，可能因云浓雾大，无法降落，只好返航。在返回途中，飞机迷失了方向，误向晋绥边区方向飞去，以致撞到了海拔2000余米的黑茶山而坠毁，机上人员全部遇难。

叶挺这位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新四军杰出的领导人带着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向往，回归到他曾为之浴血奋斗、出生入死的大地母亲的怀抱中。

八、前赴后继迎解放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置民族大义于不顾，悍然挑起了内战，在美帝国主义的帮助下，发动几百万大军向我解放区猛扑过来，妄想抢夺中国人民经过8年抗战赢得的胜利果实，新四军在党的领导下，与解放区人民一起又立即投入了消灭国民党反动派的伟大斗争。

1945年下半年，为了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部署，江南新四军部队撤退到江北，而华中新四军则以部分主力北进东北和山东。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新四军军部统一指挥山东和华中的人民军队，从进入山东的新四军与留在山东的八路军编成山东野战军，留在华中的新四军则编成华中野战军。

1945年10月，根据中央的部署，新四军苏浙军区第一纵队、第三纵队及地方干部开始陆续分路从奔牛与常州之间越过沪宁铁路，从武进、澄西地区渡江到达泰兴地区，第四纵队从吴兴、长兴、太湖一线经宜兴、溧阳、句容等地，随第三纵队跟进渡过长江。与此同时，苏浙军区第二纵队也分别乘船从海上北撤至浦东，主动放弃部分用鲜血和生命从日寇铁蹄下夺回来的土地。但是国民党反动派却一意孤行，在新四军各部北撤时，不断出动部队和军舰拦截，给我军造成了重大损失。苏浙军区第四纵队最后一批部队北撤时，由于国民党反动军队的破坏，在渡长江时发生轮船沉没，至使第四纵队政季韦一平等800余名指战员不幸牺牲。

1946年1月，蒋介石下达秘密作战命令，令国民党军队在停战令下达之前抢占战略要地。于是，山东的国民党3个军从徐州出发，向我鲁南解放区猛扑过来，妄图利用停战的幌子打新四军一个措手不及，但蒋介石的如意算盘在高度警惕的新四军将士面前拨错了子。新四军军长陈毅组织新四军的英勇健儿对来犯的国民党反动军队进行了迎头痛击。新四军以山东野战军第一纵队围攻兖州，以山东野战军第二纵队、第七师、第八师和华中野战军第六纵队，进攻枣庄、韩庄等地。对国民党反动派背信弃义的倒行逆施早已怒火填膺的新四军将士们无不奋勇杀敌，以一当百，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这次进攻。在士气高昂的新四军将士面前，国民党气势汹汹的3个军被打得丢盔弃甲，损失惨重，不得不按他们出击的路线缩回徐州。

与此同时，1月9日，在新四军有力的军事打击和强大的政治攻势下，由投降的伪军改编的国民党军第六路军2万余人在总司令郝鹏举的带领下，在台儿庄举行起义，弃暗投明。

11日，华中野战军为配合山东野战军在鲁南的自卫反击战，决定由粟裕和谭震林指挥第六、第八、第九纵队及第五、第六、第七军分区对徐州以东的陇海路进行了大规模的破袭战，并攻克了新安、运河、碾庄等10多个市镇，扫清了山东与华中之间的残敌，使华中和山东解放区连成一片，极大地壮了解放区的力量。

同年6月，陈毅指挥山东野战军在胶济、津浦铁路沿线发起大规模讨逆战役，先后攻克枣庄、德州、泰安等城市，歼灭伪军3万余人，使山东全境除了国民党重兵把守的济南、青岛、兖州、淮县等几个孤立的据点以外全部回到人民手中，为以后的自卫战争准备了战场，改善了新四军的战略态势，为埋葬蒋家王朝挖好了一个大大的墓场。

6月26日，自以为在和平的幌子下作好了充分准备的蒋介石置各方面的和平要求于不顾，悍然撕毁国共两党间的一切协议，以30万兵力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面对来势凶猛的敌人，中原军区部队根据中央军委提出的“生存第一，胜利第一”的方针，主力部队分左、右两路向西线战略转移胜利突围。

7月，华中野战军为了遏止国民党军的进攻打击他们的气焰，集中了主力3万多人，在粟裕的指挥下，发起了苏中战役。至8月底，连续作战，取得了7战7捷的辉煌胜利，歼灭国民党6个旅，8个交通警察大队，共5万余人，国民党进攻苏中解放区的兵力有40%在这次战役中瓦解。

在随后的几个月中，新四军健儿们又连续打了几个大胜仗，都取得了重大胜利，仅陈毅以24个团的兵力发起的宿北战役就将国民党军整编第二十九师2.1万人歼灭在宿迁以北地区，该师中将师长戴之奇也一命呜呼。

1947年1月下旬，遵照中共中央军委的命令，统一整编华东的新四军和八路军。新四军的番号被撤销。新四军的优秀将士们融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大家庭中，又奔赴新的战场，去完成埋葬蒋家王朝的历史使命。

新四军在1937年10月诞生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叶挺、陈毅军长的先后指挥下，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同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展开了艰苦卓绝、前赴后继的斗争，并在战斗中迅速发展壮大，开辟了华中敌后战场，在大江南北建立了横跨5省拥有8个战区的华中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不但在抗日战争中形成了与华北八路军南北呼应的有利战略态势，而且为中国人民彻底摧毁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政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近10年的浴血奋战中，新四军的英雄儿女们为我党我军树立了一面永不褪色的光辉旗帜！

